

## 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新探索

## ——《隐逸诗人的历史影像——陶渊明经典化研究》读札

邓新华, 刘传清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14)06-0115-02

文学经典问题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学术界讨论热烈的一个重要话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文学经典理论主要面临着两大“挑战”。其一,文学经典本身面临被“解构”的危机。事实上,那些早已被传统认可的经典,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面前,都会遇到挑战。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学顷刻被打倒。“文革”期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经典都被当成“毒草”而遭到横扫。而在当下,视觉文化、新媒体文化与消费文化完全占据了文化传播的中心,文学经典则退居边缘,似乎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其二,文学经典存在的合法性也屡屡受到质疑和批判。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就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思想蕴涵和审美蕴涵,这也是文学经典所以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某些激进的文学经典论者则认为,文学经典不过是一种审美幻像。这种文学经典虚无主义观念,误导人们从理论上怀疑文学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如果进一步观察国内学界有关文学经典问题的学术探讨,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理论层面的考察明显多于个案的研究。其实,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经典形成的真实过程从来就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张力……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包含了极多复杂因素的过程,有些因素却被我们忽略了”(周宪语)。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不应该一味纠缠于纯粹的概念分析和理论思辨,而应该回到经典本身,应该更加关切经典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通过系统、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来揭橥文学经典问题的理论实质。边利丰博士新近出版的《陶渊明经典化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就是期望通过对陶渊明经典化过程的个案研究,来呈现文学经典问题的丰富性、生动性、深刻性和复杂性,进而揭示其发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说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作家之一似不为过,但事实上他的人格境界与文学价值,即其经典性的确认,却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发现、认识甚至“发明”、再造的复杂而漫长

的过程,因此对陶渊明经典化问题的研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作者敏锐地把握了陶渊明经典性问题研究的重心所在:这就是后世的文学接受活动和阐释活动对陶渊明经典性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是哪些人,通过哪些活动,怎样将陶渊明一步一步地加以塑造,从而使陶渊明从六朝时期的一名默默无闻的隐士最终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重要的文化人物乃至中国文化别具意义的某种象征。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自觉意识到,文学经典主要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经典化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这种独特性甚至会表现为无中生有的“发明”或再造)的结合,并以一种“效果历史”呈现出来——不断发现新的东西,接受新的认识,产生新的意义,这就是意义的再生成过程,实际上也是经典的再生成过程。而陶渊明经典性的关键点正在于,其作品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再生成过程。基于此种认识,作者提出这样一种理论预设: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事实上是作家、作品等因素不断获得命名的历史。在作者看来,所谓“命名”,就是批评家对作家和作品“对话”的一种方式。后世的阅读者和批评家总是从自己特定的立场和现实需要出发,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总是要以个人化的方式去对陶渊明进行重新塑造,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而以个人的方式对陶渊明进行重新“命名”。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史对陶渊明的每一次重新“命名”,都意味着特定历史语境下新问题、新视角的出现,而这种重新“命名”的过程,无疑已经融入了阐释主体对陶渊明经典化的选择、参与和创造。在作者看来,既然“命名”是陶渊明经典性得以显现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么,“释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边著的理论切入点。

按着作者上述对陶渊明文学经典性问题的基本理解,边著分三个时期具体深入地探讨了陶渊明的经典化历程。

六朝是陶渊明经典性的奠基期,边著首先关注的是陶渊明诗文创作中的自我形象问题。作者以陶渊明自己作品所描绘的历史人物为材料依据,分析了陶渊明笔下的“自我”形象。作者认为是这种具有自我期待性质的“自我形象”为陶渊明经

收稿日期: 2014-09-20

作者简介: 邓新华,男,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刘传清,女,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典形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边著深入探讨了“陶彭泽体”的原创性问题,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首次命名问题,以及萧统对陶渊明作品的选录及阐释使陶渊明作为诗人的历史地位初次显豁化等问题,从而较为清晰地揭示出此期陶渊明的经典性是如何得以初步显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边著对此期间陶渊明经典性的探究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出发,根据人类学借助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的思想,通过全面梳理、细致分析陶渊明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对陶渊明的自我期待与自我建构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我以为这十分有利于我们准确、全面地理解更为真实的陶渊明历史形象。陶渊明与颜延之的关系也是边著用力较勤的一部分。颜延之与陶渊明有密切交往,是陶渊明生平的重要见证者,也是其事迹的最早记录者。边著对陶渊明与颜延之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初步廓清,从家族传承、伦理观念和文学潮流等角度分析了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密切但对其创作评价甚低的原因。

唐朝是陶渊明经典性的形成期,边著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作者指出,作为田园创作的“艺术先行者”,陶渊明开创的山水田园诗体也即“陶彭泽体”,对唐代颇具声势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起了一种先导作用。不仅如此,陶诗表现的田园情趣,也在唐代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作者把这称为“诗歌情趣的经典化”。总之,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大规模涌现使原本势力单薄的一“体”发展成了蔚为壮观的一“派”,这对陶渊明经典化极具促进之作用;其次,作者认为陶渊明创造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审美意象,如“东篱菊”、“五柳”、“桃源”等,已经较大规模地渗透到唐诗创作中,这些凝聚着陶渊明风神意趣的诗歌审美意象,开始由普通的“个人意象”衍化为极富蕴藉的“公共意象”。也因于此,作者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诗歌意象的经典化”;第三,作者通过考察陶渊明显典故在唐代诗歌中的使用情况,勾勒了诗人在这个时期的经典形象:隐士-饮士-诗人,这一现象作者称之为“诗人形象的经典化”。

关于陶渊明经典在唐代的基本地位问题,作者的研究与既往不同:时代风貌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差异基本决定了唐代并不是一个十分利于陶渊明经典性显现和形成的历史时期。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诗人与陶渊明的关系以及李白对其“齷齪”的评价历来就是一个难以绕过的学术迷案。边著通过系统梳理

“齷齪”词意的历史演变,借助详实的资料分析,得到了更为可信的结论。陶渊明诗歌情趣、意象经典化问题的提出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学术创见,从“艺术先行者”的角度来定位陶渊明与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关系自然也就包含有较多学术创新的成份。

自宋代起,陶渊明开始被人称为“诗人之冠冕”,这是陶渊明经典性的确立期。边著对于这个时期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用力更勤。特别对于宋人评陶渊明“耻事二姓”的政治气节,“安贫乐道”的“孔颜乐处”,评陶诗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评陶渊明的“哲人”形象,评陶诗“自然”、“平淡”的格调等,都极为细致深入。显然,作者如此全面深入的论证意在说明,此期诗人陶渊明的经典化得以确立,与宋代社会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尤其与当时文坛领袖苏轼对陶渊明的极赏分不开。

目前国内外学界的文学经典化研究有两条不同的路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边著对陶渊明的经典化研究在方法论上则注重这两条不同路径的有机结合。在作者看来,陶渊明至高无上的文学经典地位的获取与两宋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的重新建构密切相关:士风的重建事实上是由政治统治“重整纲常”的现实需要产生的,而“重整纲常”恰恰需要树立特定的“示范性经典”。从“神化”现象入手,作者进一步明确界定了陶渊明经典具有被“发明”、再造的性质,这与学界既往研究中单纯的“发现”观念完全不同。边著对苏轼与陶渊明的经典化关系的梳理极为细致深入,作者通过系统、深入研究《饮酒》(其五)的效果历史,借助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和霍布斯鲍姆“发明的传统”的理论框架,指出苏轼改造陶诗实际是将自己的审美理想投射到古代诗人身上,是要通过“自觉不自觉地修正前人的创作来建构新的诗学规范。而《饮酒》(其五)经过苏轼的改造、“发明”最终“神化”成为中国文学的理想和“神话”。另一方面,后人所熟悉的所谓“超脱人世”的陶渊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苏轼这样的话语权威“塑造”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陶渊明经典的确具有“发明”、再造的历史属性。而这种“发明”、再造的陶渊明经典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杨勇]